

目 录

1924—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派系斗争概述

.....	张 掖 (1)
中山大学林场风潮始末.....	侯 过 (11)
西南政变后中山大学的两次易长.....	邱 平 (17)
广东国民大学之回忆	朱勉躬 (遺稿) (26)
广州法政专门学校的建立及其变迁.....	莫擎天 (47)
番禺师范学校的一次校长争夺记.....	黄鹤楼 (55)
经营“安南画”的回忆.....	馮 炎 (71)
抗日战争期间的广东滑翔运动.....	叶汉生 (82)
唐紹仪生平的概述	罗翼群 (91)
唐紹仪在朝鲜的前前后后.....	杨紹权 (110)
我所知道的馮自由	陆丹林 (113)
徐傳霖角逐“国大”代表记.....	陈 波 (126)
李耀汉与阳春惨案.....	李洁之 (130)
记一个迷信职业集团	
“江相派”(下)	于 城 (135)
旧社会江湖十二招.....	謝敬鴻 (162)
旧社会广东的当押业.....	林仲葵 李达才 (185)
补充訂正.....	(197)
对《戏班和戏院》一文的补充.....	陆丹林 (197)
对《紐約唐人街及华盛顿华侨抗日救国会》 一文的訂正.....	李星川 (200)
附 載.....	(201)
本会1963年工作情况和1964年工作 安排的意见.....	(201)
正誤表.....	(209)

1924年至1935年

国立中山大学派系斗争概述

张 掖

孙中山先生为着革命的需要，曾于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間創辦两間学校：一間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用来訓練革命軍事人才；一間是广东大学，用来培养革命和建国人才；委派蒋介石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邹魯为广东大学校长。不料自中山先生逝世后，蔣邹两人旋即先后背叛中山先生生前手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为全国人民所唾弃。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内部派系斗争既日益尖锐，且无日无之，而这些矛盾和斗争，也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这間华南最高学府中来。

广东大学时期的汪（精卫）邹（魯）斗争

一九二四年二月六日中山先生以大元帅令任命邹魯为广东大学筹备主任（一九二八年夏天，邹魯赴巴黎旅行，那时我正在巴黎大学讀書，因大埔同乡关系，日夕相处。他曾亲口对我說过，中山先生初时叫汪精卫去做广东大学筹备主任，可是政府經費奇絀，汪氏自顧无魄力筹一笔开办費，不敢奉命）。邹氏于是月二十一日到任，函聘筹备委員三十五人，成立筹备处，并奉准向各机关挪借广东大学开办費。到

了五月九日，筹备工作完成，接收高师、法大、农专三个高等学校，合并而成立广东大学，設文、理、法、农四科。六月九日，中山先生又以大元帅令任命邹魯为广东大学校长。邹氏于是月二十一日就职。就在一九二四年六月，中山先生定每星期到广东大学大礼堂（即前高师大礼堂，今广州鲁迅纪念馆礼堂），演講三民主义一次。九月十九日大学上課。十一月十一日补行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翌日晚上还举行提灯大会，欢送孙大元帅北上。翌年（1925）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廖仲愷建議把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以紀念孙中山先生。但广东大学还没有来得及更改校名，而国民党内部左、右派分化已日益剧烈，汪精卫以左派面目出现，謀夺取中山大学以树势力，同年十一月通过广州政治委员会将邹魯广东大学校长及外交代表撤銷；邹魯也不示弱，联合居正、謝持、张继、林森等国民党右派元老与汪精卫对抗。可是在当时革命高潮形势下，汪精卫假左派的面目尚未暴露，复以国民政府主席地位，得到拥有軍事实力的蒋介石的支持，使邹不能立足于粵，离校赴北京开西山會議去了，校务由校务會議代理。于是代表左派的汪精卫遂以国府令派陈公博、甘乃光、馬洪煥三人为調查广东大学委員。陈、甘、馬等把“調查”两字故意改作“查办”，致函广东大学，遂惹起邹派的憤怒。十一月十四日全校教职員开大会討論查办案，議决：向国府質問，并以总辞职表示抗拒。翌日校务會議全体代表呈請国府免陈、甘、馬等調查委員职，并发表宣言。于是国府进一步于二十一日令派汪精卫、譚延闓、伍朝枢、顧孟余、陈公博五人为广东大学管理委員，以顧孟余为主席。在顧未到任前，由陈公博代理。旋又改为校长制，仍以顧任陈代。至此，广东大学遂为汪派所据。一九

二六年三月一日，汪派褚民誼接长广东大学。七月十七日国府令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广东大学应于七月底办理結束。

国立中山大学时期汪(精卫)蒋(介石)的斗争

汪派当时虽以左派势力掌握了广东大学，可是改为中山大学后，校长职权又落在蒋派手里。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蒋介石的心腹人物戴季陶出长中大。当时戴氏方臥病湖州，乃以經亨頤暫代。十月，戴氏南来，国民政府又改校长制为委員制，任命戴(季陶)、顧(孟余)、徐(謙)、丁(維汾)、朱(家驊)五人为委員，以戴季陶为委員长，顧孟余为副委員长，汪蒋二派势力平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員。校内进步員、生、工友被开除学籍、职务者达四百余人。其中有不少人被逮捕屠杀。六月恢复校长制，戴季陶、朱家驊分任正副校长。蒋介石遂达到一手抓文校(中山大学)，一手抓武校(黄埔軍校)的阴谋目的，訓練了大量的巩固他个人軍事独裁的爪牙。当时戴朱二人常不在校，戴季陶在南京做官，朱家驊也在杭州做官。他們二人把校务会交給他們的亲信、农学院院长兼事务管理处主任(等于现在的总务长)沈鹏飞代拆代行，戴、朱二人不过做遙領的校长而已。由于戴、朱长期不在校，校务废弛，因此学生会表示不滿，旋电請戴、朱迅即南归主持校务。約一星期后，朱家驊回到广州，除了請教授們吃吃飯，出席紀念周对学生們講講話外，不到一个月又跑回杭州去了，校务仍然由沈鹏飞代拆代行。由于派系斗争的关系，蒋介石始終不肯把中山大学交給他人。后来因为浙江省政府改組，朱家驊沒有民政厅厅长做了，戴季陶复以主任董

事名义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二日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中山大学董事会，当场提出辞校长职，議决以朱家驊升任校长，不再設副校长，即日請国府任命。朱氏遂于十三日由南京返广州就职。到了二十七日，他又回南京去。时值南京中央大学发生风潮，校长辞职；蔣介石身兼教育部长，又調朱家驊充任中央大学校长。于是中山大学留京董事提出以金曾澄为校长，請国府任命。易长消息传来，多以野鸡大学校长（时金曾澄任私立广州大学校长）不配接长中大，戴、朱派遂揭起拒金迎戴旗帜，策动学生罢課。十二月二日朱家驊由南京回校，既不制止罢課风潮，又不俟交代，便于十日溜回南京，以致风潮越鬧越厉害，学生看守校門，实行封鎖，不但金曾澄沒法进去上任，而且教授職員也无法出入。因此十二月十六日，校方不得不出了一张布告，禁止学生擅自封鎖校門。

后来，教授会开会，决定二十九日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員生复課大会。會議如期举行，当场通过教授会提出的“在学生复課后，戴先生未回校以前，学校如有大变动，各教授自行負責辞职”的提案。这个提案表达了拒金的决心。翌日全校复課，教授会立即电告南京戴季陶迅速来校。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戴季陶由南京回校，以主任董事名义暂时維持现状。后来，他又从容北归，校长仍是不在校的朱家驊，校务仍然是沈鵬飞代拆代行。

那时，胡汉民被蔣介石拘禁在南京湯山，国民党反蔣各派，如元老派古应芬、邹魯、邓泽如、萧佛成，改組派如汪精卫、陈公博，太子派如孙科等云集广州，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召开中央执監委员会非常會議，成立国民政府，出兵討蔣。并改派胡汉民、汪精卫、古应芬、邹魯、許崇智、孙科、李文范、戴季陶、陈銘枢等九人为中山大学董事，以孙

科为董事会主席。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許崇清接长中山大学，由于許的声望，加上当时反蔣气氛高涨，沒有人再出头反对，許于六月十五日举行宣誓就职典礼，監督員孙科讲了話，內容大意是，罵蔣介石篡夺胜利果实，实行独裁专制，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实为孙总理所梦想不到等語。

国立中山大学时期的蔣(介石)邹(魯)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广州两个国民政府合并改組，身任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及教育部部长的蔣介石 辞职下野（后来出任軍事委员会委員長），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其余各院长也均有选定。是时邹魯由日本回到上海，参与上海和会。为敷衍邹氏的面子，改任邹魯再长中大，邹魯旋即返粵，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宣誓就职。但是蔣邹在政治上斗争了多年，双方积恨未消，所以斗争仍繼續着。那时財政部长是宋子文，教育部长是朱家驊，他們控制着中山大学的經費。邹魯也自知困难重重，所以就职还不滿两个月，就对各学院、部、处、附校等发出公函說明經費困难情况，略謂：前曾經奉准由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份起，每月增加四万五千元，由財政部撥給。自国府改組，財部北迁，所增經費，既无着落，虽多方交涉，尙无头緒。本年一月份起，每月仅領十四万元，复須搭发庫券，更兼三月份方能領到二月份經費，以致維持现状，亦感困难。丁此校款奇絀之秋，非属日常必需用品，一律停止购置，俾薪工发放不致无所措手等語。还规定在五十元以上的印刷、杂支，均須学校核准，始得开支，而上学期各院部預算數額也不能再作用費标准。

此后，邹魯迭次催款，南京方面还是置之不理。是年

秋，教育部高等教育視察專員陳劍備來廣州，帶來一封朱家驊的介紹信，鄒魯借此機會立即函復朱氏，大意謂：中大為政府所有，已准增之經費臨各費共七萬五千元，乃十閱月，未發一文。本學期起，中央對於各大學一律不再欠經費，而對中大則視同化外，即庚款為全國所負擔，而廣東負擔尤重者，今各國還款辦學，亦未蒙沾潤，在理不能平，在情尤不能通等語。由此可見鄒魯被蔣派壓迫的痛苦。在那時，教職員因生活困苦，到會計部支薪時，該部恒無款應付。鄒魯唯一的目的，就是打着中山先生生前指定的石牌建築新校計劃的幌子，實現其名利雙收的野心。因此，在經費如此困難之下，仍千方百計進行籌款，他決定來一次國內外大規模勸捐之舉。那時國民黨西南執行部以汪精衛、孫科等投蔣，已改派反蔣派胡漢民、鄧澤如、蕭佛成、林云陔、許崇清、鄒魯、陳濟棠、林翼中、區芳浦九人為中山大學董事。鄒魯一方面利用全體董事名義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分電各地國民黨中央委員，征求他們列名發起勸捐。是月底，復電贊成的有：林森、李濟深、馮玉祥等四十人，獨蔣介石與其派系的中央委員都沒有來電贊成。另一方，鄒魯叫我（當時我兼任出版部主任）趕印捐冊二千本，捐冊上的緣起，首述學校現有規模，次述建校計劃和所需費用，最後要求各界鉅子慷慨贊助。洋洋灑灑千余言。至於捐款方法則分為：各省捐款，各县捐款，華僑捐款和學生勸捐四個方面進行。一九三三年寒假期間，每個學生領去捐冊一本，各向他們的親友勸捐。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至八日為春假之期，應放假四天，鄒魯親自出馬去香港向資本家募捐。不料，八日因中大林場職員打架事件發生，蔣派人物即渲染為“慘案”，發動了倒鄒的風潮。

这次风潮的真像是这样的：

四月間，邹魯为了便于自己掌握林场，派他自己的同乡同宗亲信校警队长邹礼炳率校警前往林场接替原有林警，四月八日抵达时，原有林警不肯移交，引起冲突，校警竟毆伤林场技士黃維炎、賴泰中二人。事件发生后，拥蔣倒邹派便乘机煽动风潮。初由农学院学生提出：枪毙校警队长邹礼炳，撤换事务长邹就丞，校方向伤者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情事等項要求。邹魯聞訊由香港赶回广州（他原已赴港募捐），并对学生要求一一作了答复，内容大約是，已扣留邹礼炳，邹就丞如查明有不法情事，当即撤职，校方已慰问伤者，并已函林场侯过主任道歉，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邹魯如此答复，倒邹派学生仍未满意，再鼓动召开学生大会，表示坚决贯彻前次要求，一致以罢課力爭，并組織了援助林场惨案委员会主持其事，事情于是越鬧越大。尽管邹魯于十一日发出布告，警告学生不得借端罢課集会，鼓动风潮，提出“执法以繩，諸生懷之！”的威胁，可是学生仍然沒有上課，倒邹学生戴家齐、江一勛、张进煊、王佐仁、郑以鏞、古譔、陈彬等七人占据了职员俱乐部（同德会）作为“司令部”，到处散发驅邹传单，阻挠学生上課。邹魯于四月十三日发出布告，将戴家齐等七人开除学籍，驅逐出校，可是蔣派学生仍到处进行恐吓，胁迫毆打上課学生，因而上課者仍寥寥无几。四月十八日五个学院院长发出告各学院同学上課书，二十日和二十二日胡汉民等八位董事前后两次发表告同学复課书，并且文学院全体教授三十二人也发表劝文学院全体学生一律上課堂。此时邹魯并用中山大学抗日会名义发出养电，請政府明令軍事委员会委員長蔣介石即日統率大軍北上抗日。如其不尊民意，违抗府令，則請立免其职务，

以軍權轉授愛國抗日軍人，庶亡國危局得以挽救。二十五日上午十時，擁鄒學生在大禮堂召開大會，到會人數一千三百多人，議決：1.撤銷援助林場慘案委員會；2.即日宣告一律復課；3.通過組織護校委員會；4.用大會名義發表“護校復課宣言”。“護校復課宣言”內容是：指責蔣派運用藍衣青年社進行倒鄒（宣言上說“謀亂中大”）的活動，並提出一些反蔣擁鄒的口號，如：“打倒謀亂中大的軍閥政客”，“肅清供軍閥政客利用回校搗亂的暴徒”，“擁護校長鄒海濱先生”，等等。會後，學生照常上課。但復課不久，至五月十六、十八日又有袁石之、吳炳楠、李才基等數人召集學生開會，並散發驅鄒傳單，被鄒魯發覺，又將他們開除學籍，驅逐出校。此時鄒派的“護校委員會”向全國各學校各報館各社會團體發表銑銜二電，說中大林場事件的风潮，系受南京派來的人鼓動所引起，風潮平息後，又有所謂換鄒的謠言，指南京政府為中大風潮的幕後操縱者。不久，風潮便平息下來。

林場事件怎樣會鬧起來的呢？據說，半个月前，南京派有人到來廣州，運動中大学生發動倒鄒風潮。為什麼蔣介石一系對鄒魯要這樣做呢？除了大家所知的政治矛盾之外，還有近因，那就是：當時適值熱河承德失守，全國人民要求抗戰，對蔣介石“安內攘外”节节退守的投降政策表示憤怒，鄒魯非真主張抗日者，只在利用這個時機，耍出抗戰姿態，已電南京政府出兵收復失地，復表揚宋哲之守土抗日，暗中指責蔣介石不抵抗之罪，借此為自己騙取抗日虛聲，蔣派受此打擊，自不能容忍，於是派人到香港、廣州策動倒鄒運動。

經過這一場鬥爭之後，鄒魯遂對蔣介石作進一步攻訐。他於二十二日在聯合紀念周中的報告，便以《蔣介石降日真

相》为題，大罵南京的賣國賊。當時他說，蔣介石自從“九·一八”以來，從未下令抗戰一次，甚至如十九路軍，如宋哲元、孫殿英、商震的自動抵抗，還要受到蔣的制裁。近來則竟與日本妥協，承認日本所設置的偽滿洲國為基點的对日妥協或和議。他又說，此次妥協，吾人萬不能認為《中日妥協》，只可認為是“蔣日妥協”，而蔣日妥協絕不是今日始，現在不過已告成功而不得不暴露出來罷了。當民國二十年，兄弟到上海參加和會時，已得到確實報告，說蔣介石派黃郛與日進行妥協，已經成功，後來蔣又派戴季陶三次秘密渡日本，與日協商，其所以尚未成功者，不是蔣有何顧慮，不肯屈就日本，只是日本在那里覓相宜的主顧而已。對於日軍的得寸進尺的問題，鄒說，蔣的軍隊已不抵抗，對於其他決心抗日的部隊，却極力加以壓迫。如方振武率其所部鮑剛、張人杰兩師出娘子關北上，及師行至望都，何應欽的北平軍分會便急調白鳳翔、杜繼武兩旅前往攔阻。至於前綫抗日部隊，不獨不發餉，甚至子彈糧食，亦不加接濟。鄒又說，灤東五縣之失，系該地駐軍于三月五日奉令撤退。此地戰事，僅有小接觸，報紙上所說如何激戰，都是北平軍分會假造消息，以欺騙國人。又中央軍雖有北上，却處後方，專以監視其它各軍的行動。凡有諸抗日或不听命而出戰者，都受到何應欽的申飭責備。本日得馮玉祥從張家口來電：謂凡察哈爾的各軍均奉命撤退，以符日本將察哈爾划入滿洲地圖之事實。總之，蔣既決心投降日本，故對於抗日部隊，凡不屬嫡系的，務假手敵人將其消滅。他自己既不抗戰，也不許他人抗戰。

十日後（即六月一日），鄒魯又以同樣內容，用校內抗日會名義發表了“反對蔣日妥協宣言”，力致蔣介石通敵賣國罪狀十八條，並加論述。最後提出與國人約定數事，以应付

此严重局面的做法六条，内容是：1. 声讨蒋介石妥协卖国之罪；2. 誓死抗日，收复失地；3. 凡反对妥协誓死抗日者皆为同志，反之皆为敌人；4. 本上述主旨宣告国人与国际；5. 本上述主旨联络公私各学校及报界共同进行；6. 或私人或团体以经济援助或其他物质与精神援助蒋介石者，认为汉奸。

这两篇演说词和宣言，在全校员生面前暴露了蒋介石卖国的秘密勾当，尽管他慷慨激昂的议论完全别有用心，主张抗日是假的。但在客观上确给了蒋介石以打击，也骗取了一部分人的同情。当时陈济棠为了继续割据广东，与蒋对峙，对邹鲁这种高唱“反蒋，抗日”，自然感到十分悦耳。因此，这对稳定邹鲁以后数年的校长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邹鲁由此一帆风顺，名利双收，除向国内外募捐得几十万元外，是年十二月起，由于邹敏初之奔走，南京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也按月拨发现金五万元及库券一十万元给中山大学。于是邹鲁在满足自己的欲望之余，总算完成了前校长任内投出的农学院的八十八万六千元的建筑工程。而且还投出建筑农、工、理各学院和学生宿舍、膳堂等一大批工程。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举行纪念校庆十周年大会暨庆祝农、理、工三学院开幕，农、工、理三学院迁入新校（文、法两学院留在市内），这三个学院全体学生都迁入石牌上课、住宿。统计全校五个学院和员生宿舍、膳堂、办事处、水厂、电厂、工场等等建筑工程，费时三十个月，共用去建筑费大洋五百多万元。

由于中大迁入石牌，引起陈济棠争夺文明路旧校址，邹、陈的斗争从此引起；此外还有第二次倒邹的风潮与邹鲁去职；朱家驊与陈立夫的斗争及朱家驊内部的矛盾等等，拟俟以后再行忆述。

中山大学林场风潮始末

侯 过

广州市郊白云山中山大学模范林场（即今白云山林场，包括黄婆洞林场）是戴季陶任中山大学校长时开设的，面积约共二万亩，初由德国人、中大农学院森林学系教授阿善罗主办，继由德国人芬次尔（曾兼任广东省森林局副局长）主持。1932年邹鲁再任中山大学校长后，芬次尔往西北去了，我以中大农学院森林学系主任兼管白云山模范林场业务。林场一向设有驻场林警，林警中有一部分是雇用四乡村民年壮有力者充当，共同负责林场治安事宜。邹鲁重任校长后，由校警室派出一队校警到黄婆洞去接替原有林警，并派邹礼炳为林警队长。既没有事先知会林场主任，也没有携带任何公文。原有林警拒绝移交，便冲突起来，结果校警被林警驱逐下山来。这是1933年4月8日发生的事情。

我闻讯后即去黄婆洞林场查询冲突情况，适校警队长邹礼炳等也带领四个武装校警坐汽车到林场去。当我正坐在林场办公室内休息的时候，看见他们气势汹汹地走进来，四处搜查。我默不作声。其中有一个人指着我说：“你是侯主任吗？”我只说：“你不必多讲”。他们看见我的态度严肃，即将手枪放下来了。我再说一句：“你们去请邹校长处理”。（原来是年4月5日至8日学校放春假，邹鲁乘放假期间赴香港募捐增建石牌新校员生宿舍，九日接电报才返校）我即

同林场技士（技術員）黃維炎、賴泰中等乘汽車下山，警長等人也坐原車跟着回廣州市。抵達文明路中山大學校本部時已是下午五、六點鐘，辦公人員已經下班，一入校門，校警即動手毆打黃、賴二人，賴被毆受傷。我看見這樣情形，一面安慰黃、賴二人，一面進入校長室，詢知鄒魯尚未回校，乃打電話給教務長蕭冠英說明情形。他在電話中大发脾气，說即電請鄒校長迅速回校處理。

當晚農學院的學生們知道了校警毆打職員的事件之後，群情憤慨，四處奔走呼號，召開大會，酝酿風潮。次日農學院教職員正在開會討論時，全院學生同時亦召開大會，要我出席講話，我對學生們說：“我兼負林場業務，未能將林場工作做好，竟鬧出事來，我很慚愧。這種事情發生後，大家都很關心，我很為感謝！但不能急躁從事，希望同學們安靜下來，安心向學，听候學校當局合理解決。我還沒有見到鄒校長，相信見到後必會有合理解決；如果無辦法解決，再請大家幫忙。”學生們听了我的講話，似不滿意，有笑的，有罵的。農學院學生大會首先通過五項要求：（一）請校長負責處辦鄒禮炳及鄒華文等，如各犯在逃，亦要校長負責追緝；（二）請校長撤換事務長；（三）學校當局应向傷者道歉；（四）學校應保證以後不再有此類事情發生；（五）軍警不得隨便在學校扰乱。這些要求于請愿時由學生代表親自送交蕭教務長，轉交校長。

鄒魯聞訊，即于四月九日由港回校。他了解了情況之後，知事態嚴重，當即將林警隊長鄒禮炳撤差，送市公安局處理。翌日（十日）早上他親至中山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慰問因被毆傷而留醫的賴泰中，除致抱歉之意外，還詢問了事情發生的經過，得悉事務員鄒華文與此案有關，即將鄒

礼炳、邹华文先后送往广州市省会公安局扣押法办。同时将处理经过情形通知农学院同人。

到了四月十一日邹鲁以校长名义发出布告，评述事件处理经过，并对农学院学生大会所提出五项要求，作这样的答复：第一项，“林场警长邹礼炳及邹华文业经撤差，悉已扣留，并即送政府依法严办，至是否应枪毙，其权在政府，校长惟有请其依法严办而已”。第二项，“据所得报告，事务长邹就丞事后到场处理，若询明侯主任，若有不法情事，当即撤换”。第三项，“此事发生于林场，然鲁实负其责，不俟诸同学要求，早已于今晨七时到赖技助处慰问及道歉，并致亲笔函于侯主任道歉，及言处理此事之经过矣”。第四项，“当然担保此后不再有此事情发生”。第五项，“此后对于校警当益严监督，若军警则向未有在此扰乱”。

农学院学生们开大会时，教授们也开会交换意见。邓植仪院长和我们，对学校当局的处理没有意见，因此我于十一日在中山大学日报上登出启事，说明此案已圆满解决，并声明外传我曾受辱一节并非事实。但风潮并未就此结束，反而扩大起来。十一日上午全校学生更在校本部大礼堂开学生大会，通过决议如下：（一）请校长将凶手邹等交由大会监解公安局严办；（二）请校长将庇凶作恶之事务长撤职严办；（三）全校一致罢课力争，罢课到事情完全解决为限，否则永远罢课；（四）请校长担保以后无此种事情发生；及外处军警不得随便到校捣乱；（五）请校长向侯主任，黄、赖两职员及全体同学登报道歉；（六）要校长负被伤者之医药费及担保其生命安全；（七）撤换及严办大学本部校警警长。此外，还通过临时提案六条：（一）由全体同学之保证金每人扣除二毫为本会经费；（二）郑秀芳、王礼金、李大同提

出：將凶案經過情形通電全國學術機關；（三）成立中山大學全體員生援助林場慘案委員會；（四）由大會發出宣言，交委員會辦理；（五）在事情未解決之前，關於全國第四次運動會決不參加；（六）即日由本會發出宣言罷課。

此次大會之後，鄒魯認為是別有用心者所鼓動，準備採取高壓手段對付，所以在大學布告中說：“林場毆人之事，系教育行政範圍，且早已完結。若仍有借端罷課集會等事，希圖鼓動風潮者，魯為學校計，當執法以繩，諸生懍之！”可是布告貼出之後，並未能制止學生罷課。甚至使風潮越鬧越大起來了，更有農學院學生戴家齊、江一勛、張進煊、王佐仁，文學院學生鄭以鏞，理學院學生古譔、陳彬等七人佔據了校內教職員聚會的同德會為鬧風潮的指揮所，發號施令，阻止同學上課，並散發驅鄒傳單。到了四月十三日鄒魯先發制人，發出布告開除上述學生七人的學籍，限即出校。

在風潮越鬧越大的時候，四方八面紛紛函電詢問情況，謠言叢起，或說是蔣介石派人來策動倒鄒，要戴季陶再長中大；或說是林翼中要染指中大，也有人說將由某某出任校長。記得四月十二日即鬧風潮後的第四天，廣東省會公安局長何舉（徐聞人，陳濟棠親信）來找我（他和我常在廣州市文德路古董鋪玩賞書畫古董，因此相熟），說“陳總司令（即陳濟棠，是當時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常務委員、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廣東綏靖主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很擔心這件事，要他（何舉）來了解情況，希望能早日合理解決，以免影響視聽。他還說：“政府對這次風潮內情很清楚，另有政治問題，與侯主任無關，請放心！”何舉所說另有政治問題，當系指與南京方面有關。但此次反鄒運動不限於戴朱系學生，因此鄒魯雖然採取斷然手段開除了帶頭鬧事

的七名学生的学籍，并即驅除出校，仍未能將風潮平息，還有鬧事學生公然毆打上課的學生，以致上課者寥寥可數。同月十八日由文、理、法、醫、農五個學院院長出布告勸同學上課；二十日及廿二日胡漢民、鄧澤如等中山大學八董事前後兩次發表告同學書勸勉復課，文學院全體教授三十二人（吳康、何思敬等）發表勸文學院全體同學一律上課書。於是形勢急轉直下。到了同月廿五日，擁護鄒魯的學生一千三百多人在大禮堂召開大會，一致決議：（一）撤消援助林場慘案委員會；（二）即日宣告一律復課；（三）通過組織護校委員會；（四）用大會名義發表護校復課宣言。宣言中有：“至今校中仍有少數不法之徒，敗群之馬，因具政治背景，受人利用，供人傀儡，竟糾眾騷動，散發危害學校之傳單，……更有校外暴徒李鉄魂、黃浦云、李大同等竟于四月二十日深夜击鐘鳴炮召集徒眾，散發罷課驅鄒傳單。吾人茲為保重學業，愛護學校計，特于本月二十五日開全體大會，即席議決即日全體復課，并組織護校委員會，以努力于肅清危害我校之惡勢力，鏟除我校搗亂之暴徒，而維持我校之秩序與光榮”等語。自此之後，全校學生照常上課，一場風潮才告平息。

林場風潮結束後，還有余波：五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袁石之、吳秉樞、李才基等數人召集同學開會，散發驅鄒傳單，当即又被學校開除。在南京的中山大學一些同學以留京中大同學代表名義于五月九日向行政院教育部請愿，要求撤換校長，為了此事，護校委員會特發出銑電極為鄒魯迴護。

據說這次風潮發生後，有幾位學生被捕，後來也被保釋了。但仍有些學生對這事表示不平，也有對我表示不滿的，我曾接過不少咒罵我的信，其中一封恐吓信說：“將來公安

桥（在鸡頸坑口，由公安局出款建設的）就是你（指我）寿終正寢的地方”。聞說当时尚有学生被捕而不知下落的。

中大林场风潮，前后达一个多月。风潮平息后，我本来保存一些有关文件，因抗战时东奔西走，被失落。过了三十多年，所能記憶的不多，脑海中只有一些輪廓。此文中大部份的事实，都靠一些友人閱当日中山大学日报，抄录对照，綴集写成；錯漏之处，希批評指正！